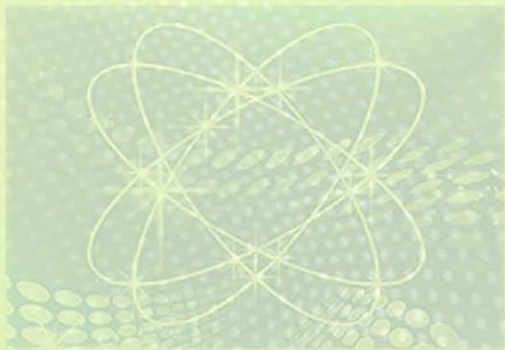


文史风景线

⑤⑥

元世祖忽必烈（上）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文史风景线

⑤⑥

元世祖忽必烈（上）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世祖忽必烈/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修订本.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7.11
(文史风景线)

ISBN 978-7-5373-1465-7

I. 元... II. 北... III. 忽必烈(1215~1294)—生平事迹—青少年读物 IV. K82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0401 号

文史风景线 元世祖忽必烈(上)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 邮编:830049)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32 开

印张:600 字数:9000 千

2007 年 12 月修订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978-7-5373-1465-7 总定价:2560.00 元(共 1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21 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21 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

编 者

目 录

第一章	开平称帝	1
第二章	争夺汗位	19
第三章	巩固政权	66
第四章	灭南宋	104
第五章	统一西南	147

第一章 开平称帝



忽必烈是在父兄们东征西战的戎马生涯中长大的，父亲死时他 18 岁。这位皇孙长大以后，与“黄金家族”其他成员相比，有一点明显不同：他的注意力不单单只在军事征伐上，更关心对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如何治理，由谁来治理。

蒙古人接触汉文化自宗教肇端，丘处机、海云是他们最早信服的人物，从这些人身上汲取的汉文化养料，最初多是个人安身立命之说，道释两家如修身、养生等一般道理，他们最感兴趣。可作为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面对高深的汉文明，蒙古人只能采取一种实用态度，他们虽然欣赏道释修养之说，但更喜爱汉人工匠锻造的精美器物，对于汉文化中物化了的实物

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于玄妙哲理的兴趣，一旦接触到汉文化的玄深之处，除少数人如忽必烈、真金、图帖睦尔（元文宗），大多数蒙元贵族都会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不得不与汉文化保持一定距离，同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简易而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藏传佛教。他们奉藏僧八思巴为帝师，请他创制蒙古新字，作为官方语言通行，从而在蒙古族文化中渗进了藏文化元素。八思巴字的通行，不仅解决了蒙古官员因普遍不识汉字而在执行军务时遇到的诸多麻烦，而且也维系了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人们使用一种语言所形成的特殊思维方式，也就保持了下来。蒙古官吏不必识汉字，也可履行职责，这在客观上就为稳定蒙古人与汉文化之间的距离提供了可能。因此，蒙元统治中原上百年，他们在文化和心理方面始终没能征服汉民族，但同样他们也没有被汉文化所融合。元朝建立之前及其覆灭之后，蒙古族一直是一个在文化素质上独立的民族。

尽管如此，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政治伦理对蒙元帝王的影响仍然是深刻的。有元一代，历朝帝王对汉文化应持何种态度，在制定施政纲领时如何处理蒙俗与汉法的关系，始终是蒙元贵族内部斗争的焦点。忽必烈一朝，效行汉法，以汉法治汉地，这使他与保守派宗王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刻，甚至导致残酷的战争。但他赢得了众多汉人的强有力支持，他们帮助他完成了统一大业，奠定了百年大元的政治基础。在这方面，可以

元世祖忽必烈（上）

说恰是海云、子聪以及那批汉族臣僚，为他指引出一条通向中原帝王宝座的智慧之路。对于子聪说的话，忽必烈不仅满意，而且十分信服，子聪提出立省设官，蒙哥时期未能实行，忽必烈上台后立即照此办理，以此推行汉法。

蒙哥即位，做出两项重大军事部署。他命四弟忽必烈统领漠南汉地事务，同时南下征灭大理国（今云南大理），为侵略南宋做战略准备；命六弟旭烈兀西征波斯。

征大理一军共十万人，由兀良合台指挥军事，儿子阿术随从，文臣有姚枢、子聪、张文谦等，武将除蒙古、色目将领外，有汉人董文炳兄弟。蒙哥汗二年（公元 1252 年）秋天，大军出发。三年夏，驻六盘山休整。初冬，忽必烈和兀良合台借道吐蕃东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进入大理。抵抗是顽强的，杀戮是残忍的，顽强的抵抗没能阻挡住蒙古军疯狂的攻势，数月之内战事便大体平息了。四年春季，忽必烈留下兀良合台率一部分军队镇守大理，自己带余下部队踏上北归的路途。

自从管理漠南汉地之后，忽必烈面对的是中原一片烂摊子，土地荒芜，人口流散。子聪自故乡回到和林，曾向忽必烈说起邢州的情况，他告诉忽必烈，邢州过去有居民一万多户，由于连年战乱，现在只剩下几百户，凋零破败，一天不如一天。忽必烈对此十分重视，于蒙哥汗元年在邢州设立安抚司，派张耕任安抚史，刘肃任副史。这以后邢州局面大有改观，忽必烈

元世祖忽必烈（上）

也很是高兴。从治邢开始，忽必烈着手大规模治理中原地区，二年在汴京设经略司，三年在京兆（今陕西西安）立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同时在河南、陕西实行屯田，以充军饷。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中原，忽必烈将自己的藩邸南移到桓州一带，在金莲川开设幕府，招贤纳士。四年秋天，他从云南回到桓州。

蒙哥汗六年（公元1256年）春，忽必烈命子聪在桓州选地建宫室。经过勘察，子聪选中了桓州东面、滦河上游北岸一块地，用三年时间建起了开平城。开平不仅是忽必烈的王府，也是他早年的根据地。他在这里积蓄力量，清理心智，计划着一生的事业，就像一只苍鹰在羽毛逐渐丰满的时候，不停地训练飞行能力，时刻准备离开巢穴飞向天空。他就像这只苍鹰，俯瞰着中原大地，那里有财富、权力和荣耀，有他的梦想。

开平城破土动工之际，忽必烈身边已经聚集起各派势力，他们构成一个利益集团，彼此独立又结为一体，这个集团深刻影响了元初政治体制。

在这些人当中，除子聪和尚外，还有王鹗、郝经、赵璧、廉希宪、窦默、姚枢、许衡、张文谦、张易、商挺等人。这些人大多数是汉人，具有规范化的儒家修养，深谙文韬武略，有的人既能讲经论道，也能领兵打仗。他们聚集在忽必烈身边，向他灌输孔孟学说，为他讲解《孟子》、《尚书》、《孝经》及程朱理学，他们在用一条无形链索竭力要把他拉向汉学的深沉领域，毫不

在意他对孔孟之道是否能够一下子全盘接受。

然而忽必烈正是通过他们窥见到了一种体系完备的文明，这种文明给他指明了个人心性得以超脱的方式，也为他提供了治理天下的大政方略，无论是玄妙的哲学还是实用的谋略，对他都具有强烈吸引力。忽必烈不能不意识到，除非借助这种文明，否则单凭凶猛的蒙古骑兵，即使赢得天下，也难以治好天下，因为自己的祖先没有那么久远的过去，自己的民族也还没有强盛到那种程度，可以为她的子孙准备好他们需要的一切东西。

在忽必烈身边还有一批为他出生入死的汉人武将：顺天（今河北保定）张柔、真定（今河北正定）史天泽、东平（今山东东平）严氏、济南（今山东济南）张氏。这些人本是地方土豪，金朝亡后依附蒙古，统辖各自境内军民政务。他们一般都拥有数万兵丁，结寨自保，一旦朝廷有军事行动，则随官军出征。他们的地位也很稳固，如果不是触犯朝廷，那么父死子继，兄终弟及。重要的是，他们负责征收地方赋税，掌握着地方经济大权，这就使他们成为独霸一方的世侯。

在中统、至元年间的历次战事中，他们金戈铁马，出生入死，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史传忽必烈“尤善抚下”，大概不假，要不这些文臣武将就不会追随他赴汤蹈火，几十年不改初衷。当然，这仅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尚未涉及他们与朝廷更深

层次的利害关系，但仅就这一般意义来说，已经能够得出一个结论：与其说蒙古人打败了汉人，不如说汉人中的一部分借助蒙古人的力量征服了本民族的另一部分。

经过几年治理，中原面貌有了改观，增加的户口可以补充兵源，增收的粮食又可以补给军需，忽必烈的实力大大加强，这只苍鹰的羽毛已经丰满了起来。

蒙哥汗七年（公元 1257 年），忽必烈奉大汗之命在驻地主持了第二次佛、道两家大辩论。佛教一方出席的有福裕、那摩、八思巴、子聪和尚等三百余人，道教一方出席的是以全真教头领张志敬为首的二百余人，另外出席作证的官员有孟速思、廉希宪、张文谦以及窦默、姚枢等二百多名儒士。大会事先约定了对失败一方的处罚办法。可以想象，数百人参加的辩论其场面该是何等壮观，那些自称超然世外的出家人为了争夺在朝廷中的地位和田产，冒着被处罚的危险，唇枪舌剑，互相指骂。或许张志敬事先没有料到，失败的一方竟是道教，结果按约定，十七名参加辩论的道士被削发为僧。忽必烈下令焚毁四十五部道经，将二百多处道观改为佛寺。

忽必烈年轻的那段时期，蒙古统治者对中原汉人宗教既重视又加以利用，成吉思汗对丘处机、中观和海云的友好态度便是例子。忽必烈成年后，他以恭敬和兼容的姿态礼待各家教派，不仅收罗了一批汉人儒生，还接受八思巴为自己一家传

授灌顶，据马可·波罗记述，忽必烈对西方基督教也颇有兴趣。

纵观有元一代，世界各大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均在中国获得了令人惊讶的发展。至于中国本土的儒、道、释三家，境遇却略有不同，藏传佛教势盛，中土佛教处境亦可，道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唯独儒家前后有如天上地下。忽必烈早期重儒，儒生在朝中左右大局，李坛（音：坛）之乱后，儒生地位下降，似乎未再掘起。南宋诗人郑所南曾说：“黠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九儒十丐”，儒生在各人等中仅强于乞丐。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写过一首《自笑》诗：“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可谓生动透彻。

四弟势力在中原一带的增长，引起大汗蒙哥的猜疑。就在忽必烈主持僧道大辩论的同一年，蒙哥委任亲信阿兰答儿为陕西省左丞相、刘太平为参知政事，派他们到京兆理算钱谷。二人在京兆设钩考局，查核忽必烈封地内的赋税。在查核过程中，他们罗列了当地官员一百多条罪状，杀死二十多人，扬言除史天泽等少数人外，其余官员一律处死。身处恐怖环境内的官吏们人人心惊胆战，当时陕西宣抚司的几位头面人物有廉希宪、商挺、赵良弼等人，幸亏他们从中周旋维持，宣抚司才平安无事。

这一行动触怒了忽必烈，得到从陕西报来的消息后，他可

元世祖忽必烈（上）

能考虑过要用某种方式回以颜色，证明自己不是软弱可欺的。老臣姚枢劝他采取退一步的策略，先缓和兄弟间的紧张关系，再做长远打算。姚枢建议，不如将王府亲眷全部送到和林，作出久居的样子，这样就会消除大汗的疑虑。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亲自将家眷送到和林。兄弟二人见面后，相对立下，蒙哥没有让忽必烈做出表白，就下令撤掉了钩考局。

一

蒙哥汗八年（公元 1258 年）春，蒙哥下令伐宋。大汗留七弟阿里不哥守和林，自己同九弟穆哥、万户史天泽率西路军过六盘山取川蜀，宗王塔察儿率东路军打荆襄，已在云南的兀良合台、阿术父子起兵北上，形成对南宋长江中游的夹击之势；大汗命令四弟忽必烈留守驻地不动。

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安排，据说蒙哥不让忽必烈率军出征，表面上考虑他征完大理，又患痛风，让他在家休养，真实原因则是蒙哥想同忽必烈争夺中原控制权。得到命令后，侍臣燕真提醒忽必烈说：“大汗素有疑志，如今远涉危难之地，殿下身为皇弟，却独处安全，这怎么行呢？”而忽必烈即使明白这种安

排背后的真实动机，可没有大汗的命令他不敢轻举妄动。

幸好大汗的部署不久就出现了问题：宗王塔察儿在南伐期间，热衷于抢掠财富，恣情享乐，久无战功，惹得蒙哥发怒，撤掉塔察儿，命忽必烈统率东路军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并召益都（今山东益都县）行省李坛派兵从征，李坛以“益都是南北要冲，兵不可撤”为借口，拒绝派兵；又命兀良合台驱军打潭州（今湖南长沙），然后与东路军会合。大汗约定，西路军取得川蜀后，挥师东进，与东路军、云南军三军会师，再沿江东下直捣临安（南宋首府，今杭州市）。

这是一个庞大而且劳师费财的作战计划，蒙古人倾巢出动，数路大军似数把锋利的尖刀从不同方向插入宋朝国土。如果按蒙哥汗的设想，三军会师后直捣临安，那么南宋朝廷覆亡的时间只会在六十年代，而不会延续到七十年代，因为这个计划使人感到，这是蒙古人决心灭亡宋朝的一场决定性战争。然而，一个突发事件却意外地中止了计划的实施，紧接着引发了一场蒙古国汗位之争。灭宋计划被搁置下来了，临安政权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春天的计划在实施的初期进展得相当顺利，三路大军沿途风卷残云，势不可挡，宋军面对北方骑兵的疯狂呐喊和马蹄扬起的阵阵尘沙丢城弃寨，无力自保。可十六个月后，北方骑兵遇到了他们自起兵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强大阻力。

蒙古军素以马上称雄，辽阔无尽的大草原是他们崛起的地方，是他们攻伐的最主要、最熟悉的战场，寒冷的气候对他们不构成严重威胁，绿色草原又是马匹食之不尽的天然粮仓，他们喜欢在旷野上策马奔驰，把追赶上敌人并杀死他们当作人生乐事，蒙古骑兵的凶残及坚韧是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与之较量的。可是，一旦进入长江以南地区，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巍峨陡峭的丛山密林、连绵起伏的丘陵沼泽、纵横交错的河流港汊，还有酷热湿闷的天气，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极不适应。更令他们难以忍受的是长时间在同一地点攻城拔寨，那简直就是一种煎熬，蒙古骑兵不得不采用与他们的传统经验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而这种方式恰恰是他们的敌人最拿手的。

跟随忽必烈一同南下的谋臣郝经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当时他的心情大概不会太好。郝经了解宋军，也了解蒙古人，深知蒙古骑兵的长处和短处，以及他们的作战方式，这种方式曾一度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一次又一次地给蒙古人带来巨大的胜利和喜悦。但是若换一个环境，就像眼下在长江以南地区，情况完全改变了，旧的方式就很难适应新的地理与气候条件，胜利也就不那么轻易地能够得来了。一路上郝经思考了许多问题，对北南双方的军事形势也有自己成熟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时常让他感觉不安甚至恐惧，他仍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向

统帅陈述这些看法。他知道自己不赞同蒙哥汗的这次行动，也知道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但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且努力用自己的想法去影响东路军。

对于这次作战计划，郝经反对的理由明确而系统。在他看来，南宋朝廷还占据着中国半壁江山，虽无望收复中原，但兵力充足，百姓渴望太平，如果此时大兴兵戈，恐怕难服天下人心，因此灭宋时机尚未成熟；要紧的是“黄金家族”分裂后，宗王、诸侯各怀心思，都瞄准国家最高权力，伺机而动，希望给自己争得更大利益，国家危机四伏，如果此时出兵伐宋，大军在外，内部一有骚变则返之不及，因此当务之急应是励精图治，而不是挑起兵端。

南下途中，郝经不只一次地向忽必烈谈起这些想法，希望他能够认清其中利害。东路军行至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时，有人截获到一份上报南宋朝廷的奏议，其中说到“谨边防、守冲要”等抵御蒙古军南侵的治军方略。忽必烈召集属下商量对策，郝经说道：“自古得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如今宋朝未有败亡之衅，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大王不如修德布惠，控制诸道，以待西师，上应天心，下系人望，顺时而动，宋不足图也。”听完郝经的话，忽必烈未置可否，只问是否同张柔商量过。

这种态度背后是否隐藏着他与蒙哥之间的那层微妙关